

罔两的回望与再询——  
许维贤《从艳史到性史》专书座谈会记录

王思扬（整理）；许维贤（校订）

**地点：**台湾世贸一馆台北国际书展国立大学联展展位A501

**日期：**2016年2月18日

**主持人：**刘人鹏教授（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以下简称“刘”

**特别来宾：**何春蕤讲座教授（国立中央大学英美语文学系）以下简称“何”

**主讲者：**

纪大伟助理教授（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纪”

曾秀萍助理教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以下简称“曾”

谢静国助理教授（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以下简称“谢”

蔡孟哲先生（国立清华大学博士生）以下简称“蔡”

**整理/校订：**王思扬（新加坡南大中文系研究生）、许维贤（新加坡南大中文系助理教授）<sup>1</sup>

**刘：**今天向大家推荐和讨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许维贤的《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许老师昨天特别来一封信说他很想来到现场聆听各位的评论，但因工作关系无法前来，要我代为问候大家。今天本来还邀请了叶德宣老师，但他因为身体不适，也不能来到这里。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五位讲者。首先是非常难得邀请到的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何春蕤老师。何老师其实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催生者，等一下她会讲。接着按发言顺序，首先是清华大学中文所博士生蔡孟哲，然后是东吴大学中文系谢静国老师，然后是师大台文所的曾秀萍老师，再来是政大台文所的纪大伟老师。相信诸位发言会非常精彩。下面就请何老师开始。

---

1 感谢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和国立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中心联办这场座谈会，亦感激主持人和诸位讲者莅临讲评。座谈会记录曾寄给诸位主持人和讲者过目/修订，谨致谢忱。谢谢王思扬整理座谈会录音初稿，文稿终极版的整理和校订由许维贤完成。

**何：**大家好，我的角色是“接生婆”，这本书能在中央大学出版社，我确实是最早“拉皮条”的那位。今天有四、五位对这个主题有研究的专业学者在座，分析和评论的工作就留给他们，我就说说接生的经过吧。

2012年底，许维贤写电子邮件给我——在这之前我已经认识了许维贤——他说他写了一些相关的论文，都在同样一个领域里面，他想试试看能不能把它们集结成书。他原来想的时候只是想要集结一些论文成书，希望找个机会出版，问问看我们性/别研究室或者中央大学有没有什么机会。那个时候其实蛮巧，因为2012年中央大学出版社与香港大学出版社合力出版了一本跟同性恋研究相关的书，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就是黄道明的专书《酷儿政治与台湾现代性》。那本书也是我拉到中央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发现销路奇好，当年成为中大出版社销路最好的一本书。所以我在想，学术出版看来也有一定的市场，说不定我们应该也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许维贤跟我讲他想要集结成书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于是我就回信鼓励维贤：“把散见各处的文章集结到一起，显示一个学者的研究范围和成果，是个好主意，不过，要把书编成有主题、有涵盖、有基本核心论点，也还需要一番心力，你就动手吧。”他说好。当然我就这样“害”了他，因为他要花很大的时间去改写这本书。

2013年，也就是一年后，维贤又写信来跟我说：他还在努力当中，因为家中老人生病了，所以两头烧，很辛苦啊，可是他还在拼命的赶。然后到2014年，他说有一个初稿出来了，希望我能看一看。我这个人是很多事的，看一看就说：“不行啊，你的逗点太多了……等等”，然后就挑了一些写作上的毛病跟他讲要改写。同时我把书稿先给中大出版社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兴趣。中大的回应还来得蛮快的，说：“不错啊，我们可以送外审。”我就催许维贤：“你赶快准备一个书稿，把它送出去。”

大概到了2014年秋天，许维贤写信给我，说这个书审查已经过了，有很好的修改意见，他准备再动手改写。任何写文章的人都知道，只要说是要修订、修改稿子就是要命的事情，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改写，然后再加上整本书这么长，前后能不能统一，能不能首尾呼应，成为一个完整的主题书，这都是改写过程中要注意的事，所以他也很累很累。他想要请我写序，可惜的是，我因为刚好当时在忙着写要去印度演讲的讲稿，完全没法抽出时间，再加上一直觉得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知识疏浅，因此最终只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推荐语。

后来维贤又花了好几个月改写这本书，他写电子邮件给我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在改写过程中的痛苦，这边还是不满意，那边还是要改，但是你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用心的人，这年头蛮少见的。这本书拖到了2015年才出版，但是最令人惊艳的是，最后出版的版本已经和最早我看过的稿子有了很大的不同，这表示维贤一直在用心思考，不断的修订改写。我们在台湾常常因为论述战场上的争战对立而使得学术工作趋向于立场的表述或批判，发表期刊论文也是短文和短打，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像维贤那样，以一本书去深度挖掘，仔细分析，整理历史，这种扎根的慢工出细活因此就更有其必要性。我看到这个人可以花这么大的功夫把自己的东西整个改头换面重整后写出来，这个毅力我觉得非常佩服。

从研究主题来想，黄道明研究的酷儿政治与台湾现代性，和许维贤研究的现代中国同志书写与男性建构，其实都指向了在华人历史社会情境里国族/民族主义和性别、性议题之间的紧密关连，而这个国族/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形貌也都牵涉到更为广泛的国际局势和其中的压迫斗争。作者们的历史分析因此显示了一个和当下台湾同志运动很不一样的眼界，所面对的并不只是什么个人认同身分、公民权利、尊重多元的问题而已，而是有着更为广大深远的政治含意。特别是目前台湾国族主义和性别政治的结盟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状态，西方文明所拥抱的“同志国家主义”不但巩固国族定位、国际布局，也在台湾内部形成规范强制的道德要求。面对这样的发展，像黄道明、许维贤这类的历史分析和知识生产就更有意义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更大的图像来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

顺便提一下，我其实很高兴来到这个场地，因为这个场地看起来很有气质，国立大学出版社联展是个很好的策略，显示各大学越来越看到各自的学术出版可以和社会现实衔接，可以和社会议题衔接，也可以和大众展开亲密地对话，学术研究的出版也不用再使用很拗口的、读不懂的学术方式，而能够有一些比较可以跟大众普及、对话的书籍。这样的联展也在此让各校的特色慢慢浮现，这是个非常好的发展。现在看起来，这个出版数量也已经不少了，各校如果能有持续的出版、积累，相信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前途也是前景可期的。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帮大学出版社“拉皮条”，催生各式各样新的书籍，希望能够让大学的出版成为另一种学术积累的生根方式。

言归正传，今天要来谈许维贤的书的不是我，而是在座的几位年轻的学者从他们的学术研究角度来谈。我就在这里把这本书推出来，推荐给大家阅读、思考，让它加入台湾同性恋运动有关公民地位、国族政治、国际政治的发展，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这方面的讨论。下面，就交给这几位年轻的朋友来对这本书提出他们的看法。谢谢。

**刘：**谢谢何老师！从这本书的写作到出版，到这本书里面重要的意义，何老师都给了精彩的解释。如果不是何老师慧眼识英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本书，谢谢何老师。下面我们从最年轻的蔡孟哲博士开始。

**蔡：**大家好，因为我是最年轻的，会紧张，所以我写了一个稿子。刚好之前写的这本书的书评刊登在在座的曾秀萍老师主编的《台湾学志》第12期里面。我会大概讲一下我写的这个书评，然后可能会穿插一些我最近做的1920、30年代中国同性爱的研究，其实也是受了许维贤老师书里一些段落的启发。我可能会试着往前推进一点。很抱歉，如果待会儿有点无聊，因为念稿，就没有办法像刚才何春蕤老师这么活泼。

**何：**哈，我也有备稿。

**蔡：**台湾的同志文学、性/别研究与酷儿理论在19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成果丰硕，也影响东亚华文同志书写与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同志书写与研究的热潮与上世纪相比似乎稍有缓和、甚或退散，不过近几年同志文学研究出现转向历史的

特色，试图为台湾以往较偏重理论的同志研究带出历史纵深的视角，朱伟诚老师在其主编的《台湾同志小说选》序文里，即综览1960年代到2005年台湾同志小说的历史发展。而曾秀萍（2009）则研究白先勇1970-80年代的同志小说，认为它们展现出性/别与国族认同的相互连结，拓展复杂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想像的不同样貌。纪大伟老师的几篇研究戮力撰写台湾同志文学史，以姜贵和白先勇的同志文学作品为例，指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相互渗透，而姜贵与郭良蕙的男同志长篇小说，以及欧阳子小说里的同性恋欲望，其实都早于白先勇的《孽子》。那在年轻的研究者陈佩甄的论文里，试图比较殖民时期台湾与朝鲜的同性爱论述，挖掘当时的报纸论述及小说文本，尝试描绘两地同性爱再现的轮廓，以此来分析东亚社会的性别治理历史。另一条分析的轴线则可放眼东亚的华文同志书写，包括香港、新加坡与马华同志文学，他们关注东亚华文同志圈包括中国在内彼此互相影响的关联。我认为许维贤老师的这一本书：《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为我们展示了回望历史的研究洞见，以中国大陆的同志书写为研究范围，追索男男同性欲望从晚清到当代的历史与文学轨迹，无论是其历史钩沉的细腻工夫，或是文献分析的独特见解，对于东亚华文同志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许维贤老师主要以台湾酷儿理论“罔两问景”——其中的理论奠基者之一的刘人鹏老师也在这里——作为切入中国同志书写的理论视角，考察从晚清到近现代跨时性之男性建构的历史、文化与政治面向，进而能够挖掘出与连系起在各种语言再现权力之下“同志罔两性”的系谱，并以此询唤依附于“国族”建构的“同志”之形、以“友爱”为含蓄修辞遮掩同性情欲的影子。接下来这一段是我引述许维贤老师书里的话，他说：

在近现代中国从艳史到性史的历史语境下，“形体”的位置可以是国族主义的“同志”主体，也是“现代中国性”主体，影子则是以友爱作为联盟的男性建构（详见第三章），而男色或同性爱则沦为罔两。如何主动往纵向的中国历史时间叙述争取更多属于罔两主体的诠释权？这是同志书写一边在争取当下公共政治的横向空间合法性的同时，有必要加倍努力的方向。（许维贤，2015，页34）

我认为许维贤老师的企图是“拨正反乱”，以男色情欲关系的艳史传统，来回应中国传统朝官正史与以西方性科学为本的性史的这种“阳刚大叙事”，推进汉学研究对于中国传统男性气概的讨论，然后他提出新的理论范式叫做“‘老同志’一新同志”来含括近现代中国男性建构的分析。许维贤区分两者的不同在于，所谓的“老同志”呈现一元格局、推崇阳刚特性、倾向支持党国、以革命之名将所谓的“社会性”（sexuality）都收纳到民族国家的阶级论述里、以异性恋为主体视性少数为反常变态；许维贤老师极具分析与规范性的观察是，当所谓的这个老同志：“延续西方性史病理叙事机制对身体习癖的妖魔化，以异性恋正典规范的友爱，堵住诸罔两对“老同志”之形影的试探，不断武装其恐同的含蓄结构。”

许维贤认为这样的大写“同志”（Comrade）主体，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以“家国政治化”所建构的性别主体，他称之为“现代中国性”的主体。在这样的主体打造工程的里面中，男性之间的社会性差异被排除，女性成为欲望的客体，而所谓的“同性爱”成为不可想像之事，被含蓄地掩蔽、漠视或是自动选择消失。

目前研究自晚清、五四时期以来对于同性爱的讨论，倾向于解释当时同性爱论述受到“救国强种”的现代化观念影响，在民族国家及救亡图存的大叙事之下，传统的同性爱行为是社会道德的败坏、封建主义的余毒，也是国家衰亡的象征，而部分知识分子翻译引进欧洲性学知识，虽是分析同性恋，但实际强调优生保种的重要，企图达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但是许维贤也同时指出了：“这些受到西方进化论、医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等等主导的性科学所形成的性史叙事机制，尽管有小部分正面肯定同性爱，但大多数是把同性爱进行病理化。”

他认为，晚清知识分子与民国文化菁英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启蒙欲望，引进了西方知识典范，使得中国传统以习癖为身体操演核心的“艳史”欲望游戏叙事机制——比如第一章中他谈到的王韬的艳情作品或第六章讨论的陈森的《品花宝鉴》——逐渐转变为以“性史”为主的病理权力叙事机制，而这样的转变又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要打造的国族性别气质同步发展。在这个男性建构与民族主义像双螺旋般交缠的历史关键阶段，同性爱被建构成一个像中国传统的流弊一样，还有国民性缺陷，是急需面对的社会问题，要用新知识和教育方法来解决。而许维贤藉由梳理这个阶段的同性爱论述，他重新想像一个同志的系谱，他反思受父权意识型态宰制的“现代中国性”，分析批判被这个认识框架支配的同志书写与性别政治，进而对当代中国同志运动与社会提出不同的主体形构与政治方案。

我认为，民国以来的不同知识分子选择译介引入的性学知识，一方面构成当时讨论同性爱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化知识的想像和立场，包括新创学说来解释与改造中国国民：比如本书中他有一个专章讨论了张竞生。许维贤老师细致考察“同性爱”论述从民国以来的转变，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一方面挖掘出新的史料拓展既有的分析，另一方面深化既有的文献探讨未尽的面向，例如〈导论〉讨论1922、23年北京清华学生刊物《清华周刊》关于同性恋爱的正反意见，或是详细分析1929年上海《北新》杂志刊载杨忧天批评同性爱的文章，与随后引发胡秋原撰写〈同性爱的研究〉的回应，两人的文章集结为《同性爱问题讨论集》后一版再版。他在第二章里面重估性学博士张竞生在倡导性育上的价值，并且比较了《性史》与《新文化》两本杂志在同性爱议题上与同时期其他杂志的异同，其中作者初步考察张竞生妻子褚问鹃的轶事：比如与张离婚后被张爆料她有同性爱倾向，或者是胡秋原的生平，比如说解释胡秋原当时会替同性爱辩护，是因为当时他信仰社会主义与革命、还有他年轻时痛失同性密友，以及他翻译英国社会主义诗人卡宾塔的同性爱文章等等因素。刚刚提到的褚问鹃和胡秋原在1940年代都移居到了台湾并落地生根，也持续在台湾出版著述，许维贤老师提出的这些线索开启了台湾同志研究能够持续考掘的方向。

我跳出来讲一点点我最近做的初步研究，我觉得，比如说胡秋原，他在〈同性爱的研究〉里面，引述了卡宾塔为同性爱辩护的设想根植于一种友爱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论述，虽然胡秋原所称赞的替同性爱辩护的方式极具人道主义理想性和美学创造性——也就是说，卡宾塔写的《中性论》里面具有这么好的一个特质——可是我认为他也呈现出一个矛盾双重的政治想像。一方面，是胡秋原的文章所引用卡宾塔的观点，乃是以同性友爱作为一个社会连带跟政治改革的动力和基础，能够消除社会隔阂和界限，比如他在文章里提到：妇女运动能够借用这种同性情感形成团结联盟，也寄望民族与阶级斗争最后能够以人类爱为理想，然后能够达到一个世界大同的想像。可是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个友爱乌托邦把性从生殖功能和目的解放出来看起来很好，可是他其实不要那些肮脏淫乱的性的欲望，比如说他指责因兽欲而出的这种同性性交，或者是因金钱制度而生的卖淫情况——其实指的是那些男妓的情况——他也批评异性恋婚姻多半急于利益或者甘于肉欲，对照他所描述（同时也期许）同性恋是因为爱情的自由结合等等。我认为这样的友爱政治“所蕴含的这种民主精神”预设的是西方现代性下某种差异的平等，也具有文明进步、社会演化意味的同性爱观点，需排除已然不合时宜却仍然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中，带着所谓落后的历史痕迹的那种同性性欲和性交，无论男女、无论差异的这种人人友爱的社会乌托邦想像，其实要把涉及淫乱的男色，以及像是女同性爱的“磨镜”性行为加以洁淨化，或消除、去除。另外，我最近做的研究里有部分讨论了许维贤老师书里面还没有讨论到的材料，1936年有两个同性恋专号，一个是《现代青年》所制作的“同性爱问题特辑”，一个是《性科学》的“同性爱专号”，我暂时把它们区分为性科学与性道德的论述模式，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在别的场合跟大家再讨论。我把剩下的结尾念完。

最后，我有一点点对于这本书的意见。许维贤仔细爬梳与细腻诠释新旧“同志”的系谱流变及其复杂辩证，从前现代中国典籍的“朋友”关系到晚明西方传教士用以区分传统男色的同性“友道”，从民国时期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到20世纪香港的迈克和林奕华对同性恋的身分指称，从新中国的政治信仰到当代NGO使用西方，比如说MSM作为男同性性行为的那种术语。他详细地分析这些流变和复杂的情况。许维贤老师在此历史分析架构里，解读了郁达夫、叶鼎洛的同性爱小说，也分析了郭沫若童年与晚年的同性爱轶事，更深入比较改编为电影的《霸王别姬》和《北京故事》这些不同版本。他也以此臧否当代的中国同性恋书写与社会的情况，比如说在文学评论和研究中被刻意忽视的情况，他肯定了李银河、王小波、崔子恩、刘震云、曹文轩、刘庆邦等人以及一些同性爱网路作家的重要性。我认为，许维贤老师藉此试图打开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述为基底的“革命现代性”面对“同志”的矛盾，要如何在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与政治进程中思考“同志”的存在，许维贤老师提出的政治伦理在于改写过往老同志的意涵，扩充新同志的想像，召唤新的同志品种；他引用的是纪登斯“个人生活民主化”，由下至上的亲密关系变革能够取代某种遥遥无期的、弥赛亚式的左派政治里对于全面革命的进程。许维贤老师在他的结论里面写到，他期待一个自由民主在身体、情欲、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实践并展开。但是我认为这种社会主义革命和同志性少数的解放两者看似内在于历史现实与理论发展的矛盾，其实有别的想

像。在刘奕德 (Petru Liu) 老师最近出版的《两个中国中的酷儿马克思理论》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的专书里面,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刘奕德老师透过探讨中国和台湾的酷儿研究与艺术作品, 提出了所谓的酷儿马克思主义 (Queer Marxism) 的理论文化政治方核, 其实挑战的是西方模式的同志认同政治与自由多元主义。我觉得还有空间再持续对话与讨论。

最后, 许维贤老师点出信仰社会主义和支持同性爱的亲缘性上, “同志” 展现出其特殊的历史解释性。我认为郭沫若能在自传写出他的同性爱经验, 而且在他成为新中国的副总理之后仍未删除, 或许与此有关。但是这个关联——就是说左翼政治与同性爱尚未言明的亲缘性——是否因二、三十年代文人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对于同性爱持开放态度的影响, 可能还需要深入研究。那个时候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大部分都倾向革命, 转而关注社会主义与写实主义的文学。可是当阶级成为主导左翼文艺批判的主要概念的时候, 同性爱书写是如何被看成与资产阶级有关而被迫消音? 而后来新中国在文革时期甚至审判同性恋者。而且在冷战分断的同时期的台湾, 共产党员被影射成是同性恋而加以整肃, 或是同性恋也常被批判为是资产阶级予以污名化, 例如台湾文学如姜贵《重阳》将同性恋跟共产党联结、陈映真 (赵南栋) 将同性恋与资产阶级接连起来, 这些都是可以延续1920年代国共内战、连结1950年代世界冷战, 并放在东亚区域史视野之中, 持续展开的议题。谢谢!

**刘:** 好, 谢谢孟哲精彩的报告。刚刚他讲的内容很丰富, 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 想要再看的话, 他已经有一篇书评发表在《台湾学志》里面, 可以去找来看。从刚刚孟哲的报告, 我们也发现许维贤老师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和观点都非常丰富, 而且有很多的议题还值得持续地再开展。下面我们就请谢静国老师。

**谢:** 各位老师、各位贵宾, 大家好! 刚才何老师说她是“拉皮条”的, 那我肯定要先跟维贤讲一下: “谢谢恩公, 让我有机会来接近这些我已经崇拜很久的性别研究领域里面一些大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跟维贤已经认识很久了, 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也有讨论过很多跟性别有关的问题。我先从他这个人讲好了——我没有要出卖他的意思——从我认识他开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他平常在和你聊天的时候, 有时候我只是在跟他插科打诨, 他就非常严肃起来, 跟你非常严肃的谈论一些议题。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讨论和刺激之下彼此交流自己的意见。他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平常就已经是这样龟毛, 他做研究的时候更不用讲。他找资料的功夫一直是我很佩服的。如果说大家有买他的书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他第一章、第二章……发表在哪里, 有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修改。读的时候我还真的曾经核对过, 它跟原来论文的样子有什么不一样, 差别真的还是很大的。它不是表面上的说说而已, 真的是经过大幅度修改, 跑去很多很多地方去搜集资料。他这个功夫一直是我很佩服的。

而且他的雄心壮志也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事情, 他似乎想要重新去改写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关于男同志的论述, 建立一个新的诠释观点。他书里面提到的同志小说或者电影, 刺激我再重新去阅读这些东西。也因为这样, 让我有一个重新

再反思和思辨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试图要去重新诠释很多理论，比如说对一些文学术语的重新诠释，比如sexuality，或者是“老同志”和“新同志”等等的诠释，他在论文里面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去描述和诠释。而且他的严谨、龟毛的个性——有没有发现，他除了在一到六章里面不断地写这些东西之外，他还有导论和余论。我很少看到有人写导论和余论可以写这么长的，加在一起大概有110页，光是导论和余论字数就已经接近十万字了。他在导论前面又把一到六章中全部重点再做一次归纳，余论也是补充了很多很多东西，再次凸显出他龟毛的性格，他治学真的非常的严谨。

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重新再检视他里面所提到的很多作品，发现有一些东西还可以再跟他做一些对话。比方说他对郭沫若的一些描述。我会觉得这样一个在政治的光谱上，一个一直不断摆荡的人，他所选择的站位，跟他的性倾向的角色变化，中间接应的关联性，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去分析。另外，本书有提到MSM，我对于这个MSM的问题，我跟维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会觉得其实MSM在西方某些学者来讲，它可能只是一个性别展演的方式，它可能并不会真的涉及到爱，或者更深刻的跟政治有关的一些问题，它可能真的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性的取向，或者性的喜好而已。因为我有在做一些志工，在我平常所接触的一些个案，也确实遇到这样子的个案。虽然例子不是很多，但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们可能只是真的觉得我就是想要跟男人发生关系而已，这样单纯而已。

另外，维贤在书中写道1949年以后的阳刚男同志形象越来越多，像那种晚清民国的阴柔男同志却越来越少。我在想到底阳刚和阴柔要怎样去界定？到底什么叫阳刚？什么叫阴柔？仅是一种外在形象吗？还是从内心的思维的细腻度去界定？这是我想要跟维贤进一步讨论的。

这本书我已经推荐给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也会当成上课的教材。因为这真的是一本很难看到的学术著作。即使不把它当做学术著作来读，也会从里面发现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想法。谢谢大家！

**刘：**谢谢静国！对许维贤的人和书都有相当生动的描述，而且我们也看到，维贤的书在不同的读者已激起不同的问题，值得我们持续探讨。下面请秀萍。

**曾：**谢谢中大的邀请。首先，我要呼应一下何老师和前面两位老师的想法，就是许老师这本书真的是写得非常用心和用力。我以前也拜读过他期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而这本书真的是大幅改写。尤其导论把整本书的理论架构铺陈得很好。这个理论架构，从罔两问景、艳史与性史等等一些关键的理论出发，并延伸推展，展开一些对话辩证，这是非常好的，而且深入每一章，非常难得。虽然读导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点痛苦，因为很长，但是非常精彩，非常深刻和具有思辨性。许老师这本书重新铺陈了晚清以降到中华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在那些过渡时期，从艳史到性史的叙事是如何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勾连。以下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讲：



首先，讲艳史传统，以及艳史传统怎样跟当代进行对话或延伸。从这里，我要讲的是，许老师的作品反映了一种民主性的焦虑；第二，我要讲的是许老师的书里面有深刻的阶级关怀和底层意识，这个阶级关怀会与他所强调的跨国资本主义，或者是中国新兴起的自由主义建立起对话；第三，许老师这本书非常难得的是，在这么雄辩滔滔的这个过程里面，仍有对人性的关怀，对社会底层、生命样态的关怀，尤其对一些同志底层的生命困境进行论述，这些生命困境如何能够让人看见，然后跨越这种非常论述式的历史化的语言或者国族论述的语言，避免个人的生命主体被转化成很大叙述的语言而被淹没，让我们看到各种的同志生命以及罔两的状态。以下，我就从这三个部分来讲述他的书。

首先，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澄清，就是很多西方学者都觉得中国对同志是比较宽容的，但他从艳史的角度切入，他认为这些艳史叙事介于虚和实之间，是文学虚构和再现——当然，里面的花花草草的男色资源非常的多——但是绝对并不等于现实里面中国社会对男男情欲、同性情欲的“默言宽容”。他指出了这些男色其实相当有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其实只有贵族才有品评那些男色的权利，所以男色只是一个特权。他对刘人鹏老师的罔两问景的理论做了延伸、再利用，但是我在阅读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做了一些转化、改写，例如他在里面使用“默言宽容”的时候，有时候是重新定义，持续发展和推陈出新。因为在刘老师原本的论述里面，“默言宽容”多是含蓄美学，基本上都是一个负面的意涵，在批判整个中国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代的美学，其实对同志有一种压抑，但是这种压抑和暴力不用很明显的展现出来，它是通过一种含蓄美学，叫你不要讲，保持沉默的这样一种美学来实行暴力，这也是一种暴力。可是在许维贤老师的作品里面，他有时候是把“默言宽容”变成了另一个稍微正面、肯定的一个语句。这对刘老师的理论的深化或是再应用、再辩证其实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其实以后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再继续延伸。

另外，我觉得他透过“罔两问景”的理论框架，试图要打破同志文学和电影的类型框架，重新去想像同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罔两问景”的理论再应用，非常值得大家再继续接力。另外，他透过这个书去想像“同志的共同体”，这个同志的共同体从过去的革命的修辞，引申到当代“新同志”的语言。其实是结合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以及性倾向的各个层面，重新想像这个“同志”，所以书中提出了一个“新同志”和“老同志”的观点。基本上，他的“新同志”的观点指出有几个特性：第一，是新同志有差异性，抹去了“老同志”的党国属性，他希望在本书里能够去党国化，突出这个“新同志”的差异；第二，是性别，社会性别的多样性，还要追求平等性；第三，就是在强调性倾向上面，他其实追求一个各式各样的酷儿去容纳在“新同志”的这个大伞下面，譬如说双性恋、跨性别等等的议题；第四，他提出“新同志”有一种“汇流爱”的倾向——运用吉登斯的概念，去抵抗过去“老同志”强调的浪漫爱，从一夫一妻制的浪漫爱，到为党国献身从一而终的党国爱——这样一种观点。所以，他其实也是要去解构这个国族的立场。

其实，不过我最想强调的是第五点，是他想要“延续艳史叙事癖好与操演

性，以罔两问景的方式不断质问同性友爱的恐同含蓄结构，以身体作为言说介入诸种“代理主体”对异性恋正典规范的搅局”；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意义最大的。因为我个人也是中文系出身，所以对从艳史到性史这样的一套发展论述非常有兴趣。在当代的文化研究里面，通常很尊崇傅柯提出的观点，认为当代同志主体是从性学、医学这一整套机制起来的，于是会遇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同志、台湾的同志、或者是其他非西方、非欧美这些性学概念建构下的同志，难道就一定只是同一个样貌吗？许老师在他的这本书里面试图做一个突破。我有读过纪大伟老师为此书写过一篇非常好的、详尽的书评，他说许老师在书里比较突出从艳史到性史的这个断裂，可是我觉得许老师更想做的是，想要去从当代或者是民国的蛛丝马迹里面去找到那个艳史的延续，这个可能是对傅柯、对同志认同概念的某一种颠覆，或者是不同视角的一种切入；我觉得这一点在这本书里面非常重要。譬如他讲郭沫若晚年的旧诗词，运用的“含蓄美学”其实是一种艳史传统的挽歌；或是他在张国荣的扮演里面，有某种《品花宝鉴》的艳史传统，所以他其实想要上接艳史传统，而不是真的那么想要把它一刀两断。书中甚至是还有一点哀叹这个传统的不存在，或者是在当代被国族主义给剥夺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新同志”跟艳史传统或者是同志的身份认同未必是截然的断裂，可能是某种断断续续的关系，然后在不同的文本里面，它呈现了不同的断续状态。所以这个“新同志”在建国的这个过程里面，被国族主义严重的侵蚀了，但其实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里，它其实还是有断续的出现。所以我认为从此书立下的里程碑出发，我们谈同志或者酷儿也许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看：

第一，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学院论述里，常常会认为性史和艳史是断裂的，所以当代同志身份认同绝对很难跟过去的艳史传统接上关系，但是我觉得此书是在做一个突破：可能未必是那样截然的断裂。

第二，从文本的层次来讲，其实我们可以找出更多的文本去衔接艳史和性史，去看看它们其中的断裂、错位或者是交错、交织、重叠的状态。

第三，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去探讨关于底层生命的连接。书中其实讨论到非常多的都市边缘，或者非都会跟同志的连接。过去我们在研究方面也对同志身份认同大部分都跟都市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连接，认为都市的多样性或者酒吧这些资本主义兴起下的消费场所，跟同志认同形成一个正向关系。但是本书注意到了非常多更边缘的、较乡土的那个角度，我觉得这个都是以后可以连结的部分。尤其是他举出戏曲界，当然过去是以梅兰芳等等的旦角作为一个传统，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传统资产，譬如说歌仔戏，像《失声画眉》这样一个文本，或者是现实的戏班里面其实都有混杂了这种艳史传统，也许他们不会自我认同是同志，可是其实是呈现了多样的酷儿情欲，这个是我们过去研究上面比较匮乏的部分。

另外，我觉得他对资本主义和阶级的关注也非常有趣。他在里面尤其是借用了《北京故事》，就是《蓝宇》的原著小说，去论述了北京故事如何打破了欢

畅和情场的对立，把情欲和资本做了一个紧密的连接。更有趣的是，全书大部分是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在小部分地方他其实是在反思这个跨国资本主义偶尔会带来某些好处，尤其是盗版现象，盗版商因为引进了欧美的同志电影，所以让中国这个我们大家认为情欲资源相当匮乏，或者审查非常严格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同志或者非同志可以接触到这些情欲资源。这些是我觉得非常更有趣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他在里面也提出了一些反省，尤其是当我们透过消费去认同同志身份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反省，譬如说在《蓝宇》里面，他说捍东这个男主角透过一种消费性，就是性交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展示他的情欲流动。因此这种情欲流动的状态，是不是有酷儿与资本主义连接的一个吊诡？虽然只是一语带过，但是很值得大家再去思考。就是说，当酷儿在强调情欲流动的时候，它如何也可能被资本主义利用，他提问：“难道这就是酷儿认同所要的情欲流动吗？”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去思考。

另外一点，他在阐述这个共产同志，很多老同志到了新社会以后这些共产主义的理想都不复存在，反而是成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勾结的利益伙伴，有一种共谋性的结构。但是在指出这种共谋性的结构同时，许老师也许对过去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有美化的想像，所以他常把老同志的某一些理想性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结盟做一些对比，这个是一个可以跟许老师继续讨论的地方。

另外很有趣的是，许老师在整个文章脉络里面其实都非常的雄辩，而且为各种的“酷儿罔两”做了辩护，可是每每在每一章的结论，他的笔调都是有一点悲观的。这个是我当时每次看到结论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小小的疑惑，就是在正文的论述非常具有颠覆性，可是到最后指向一个现实的命运的时候，许老师似乎就没有那么乐观。譬如说，从第三章开始，他就会说：这些“酷儿罔两”会不会只是活在影片当中，一旦到了现实里面，就变成溃不成军的“胶卷同志”？就是只能活在电影里面，不能活在现实里面。那当然也就是展示出他的一个现实关怀。或者是说，郭沫若写的那些男男情欲，都是一种艳史的挽歌；或者是《霸王别姬》里面的程蝶衣，这样的一个同志罔两角色，他的出现就等于是消失；最焦虑的就是在《北京故事》或《蓝宇》里面，中国人的天堂从东方迁到了西方，因为他们已经信仰了基督教，而且是在中国同志的乌托邦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已经毁灭。我感到许老师有一个有非常大的书写焦虑：第一，他会感叹同志书写的传统不被看见，所以他很努力地去挖掘这些传统以及这些罔两的身影。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焦虑西方性史的入侵，甚至在书写里面，中国的同志乌托邦还没有建立，就已经转移到西方的乌托邦想像里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焦虑可能是我们台湾学者比较少感觉到的，因为在台湾的同志论述或者是同志书写里面，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一种蓬勃的发展。可是我觉得像许老师这样，一个马来西亚出生、在新加坡任教，要不时地跟中国对话的一个学者，会面临到那个强大的压力或者焦虑。不过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焦虑里面，如何再去看到更边缘的非中国的酷儿的位置，可能是许老师未来可以再思考的。其实许老师不止是写中国同志很厉害，他写了非常多台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同志论述，每一篇都很精彩。我觉得在那些他写台湾或者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同志论述的时候，比较没有展现出那么多面临中国的焦虑。而在这本书的叙述语言里，某种程度上作者其实是作为一个中

国文化的身份主体发声，因此，如何进一步显现出那种Sinophone的位置，可能是我们未来可以去努力或者思考的。

另外，他在里面相当批判了“友爱”的同志修辞，但我在看这些“友爱”同志修辞的时候，没有那么抗拒。我其实很同意纪老师在同志文学史里的立场，讲到那种“暧昧”，是不是一定要把同志讲得很明白、很正面，这样才是一种同志书写的肯定。如果暧昧、偷渡这种是不是就比较不好？我觉得这未必，这种暧昧的修辞其实可以刚好让我们去跟西方的出柜、现身的政治传统做一个对照。我觉得可以凸显出某种双面性，一方面刘老师说的那种含蓄美学的压迫可能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透过文学、美术的立场，是不是它还有一种暧昧层次的辩证，其实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此书的结论，作者表明非常期待那个民主化的到来。读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一点吊诡。就是说，他在整本书里面，滔滔不绝地论述了那个不管是老同志的理想，或者是新同志的理想，某种程度上我都觉得跟所谓的民主想像有一点距离，即使他用了吉登斯的“汇流爱”。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的民主想像是不是那么顺利，或是成功，或是乐观，还可以再去思考。

最后我想要讲的是，此书指出了一个生命关怀的倾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论述的时候会强调文本里面的颠覆性，但是没有去看，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那些具有颠覆性的人格，或是“众罔两”其实生活得很辛苦。譬如说，他在里面有讲到当代中国男同志不管是在电影或是书写里的一种三角关系倾向，就是“男-女-男”，中间总是要夹一个“女”，不管是《蓝宇》或是《霸王别姬》，书里提到了异性恋（不管是有没有婚姻）关系中的男同志形象，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注意，在《霸王别姬》或者《东宫·西宫》里面都有这样的角色。但是他更强调的是，男同志在这种婚姻关系或者异性恋关系里的失语，譬如说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的一种生存困境，其实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但一个男同志很难面对看似异性恋的老婆，要讲那么多、滔滔不绝，还要跟她竞争。他要讲这种生存困境，某种程度上在一般的论述里面，以历史和国族的转喻，某种程度上掏空了同志的生命力。

最后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性阅读的观点视角，我在阅读过程里面，觉得许老师一直是在为“阴性气质”作辩护，去抨击男性阳刚的国族建构，可是我觉得这个论述的话语充满了阳刚的特质。所以我在读的过程里面，我也不断地在去思考，我们在论述里面有没有可能想像另外一种非阳刚特质的论述语言或者是修辞策略？以上就是我的一些阅读心得跟大家分享。谢谢！

**刘：**谢谢秀萍！非常精彩，很细致、很敏锐的阅读，我想许维贤一定会很感动，这么多人、用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努力、这么仔细地去读他的书。好，下面我们就请纪大伟。

**纪：**谢谢在座的各位学术前辈，还有在座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边。我要接着启发我很深的何春蕤老师的话说下去，要恭喜中央大学出版社出这两本

书——黄道明的书和许维贤的书。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事，他们其实做到了国际性的大学出版社所该做的事。这两本书看成国内大学出版社出书的模范。这两本书设立了一个标杆：研究人文的研究者确实是可以写出这样规模、这样深度的专书，而不是说只是短打写论文。

这两部书并不只是在谈性别、同志、同性恋而已，而把非常重的比例都放在文学上面。我们知道，文学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其他国家，文学出版或者是文学研究本身都收到很大的挑战。其实我们现在看看在台湾，包括中国，还是有很多人投入同性恋的研究，可是很多人的考察对象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活人。当然，活人当然非常应该被研究，可是文学已经被很多不同学门的研究者忽略不顾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惜：我们在文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不管是理想或感性、欲望的博物馆或是时空交错这样的东西。中国的酒吧、浴室或者公园当然都是值得研究的对象，但是文学提供的“文本田野”仍然自有特色。

在座的几位其实体力都非常好，刚才何老师就是典范，然后刚才三位都讲得滔滔不绝，我相比之下我该没有那么多的体力。这本书其实在座的朋友其实不见得都有看过，所以说我就大概讲几点我自己想到的重点。

这本书在他的标题上其实就讲得非常清楚，它要从艳史到性史，实际上他就是在标示一个方向感，比如说从台北到高雄，从高雄到台北。这就表示从A到B，从B到A，就是要离开一个出发点，然后抵达一个新的目的地的方向。这本书其实都是在复述这个主题。他其实也把什么是艳史，什么是性史讲得很清楚。艳史，其实说得简白一点，就是他自己挪用、抄用的……其实我们还是活在艳史和性史的交错里面，比如说我们讲到“同性恋”，大家会说很“腐”、很“BL”，可是有些人还是会讲这是“断袖之癖”，有些人还是会说这是“余桃之好”——这些艳史还是没有完全消失。今天人们讲到同性恋的时候还是会怀念比《红楼梦》、《品花宝鉴》里面的一些插曲，所以“艳史”并没有完全消失。性史则是许维贤不厌其烦、一讲再讲的新体制——性史就是现代社会所讲性的机制，包括国家、资本家，或者是健保体系对于人的控制。我们早就进入这个阶段。比如说台湾的同性恋者常常都碰到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呢？”，或者“你是不是要去做变性手术呀？”有些同性恋者还是会被家长或是老师询问：“那你既然是同性恋、要不要去变性？”性史一直笼罩着我们。

这本书的作者的确野心勃勃。我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从A到B的联想，比如说从艳史到性史，或者是说从台北到高雄，从香港到北京等等这样的方向感，其实就讲了两种重要的动作。一个是断裂，一个是延续。从艳史到性史，这中间的路程，到底是断裂的还是延续的，这中间的路程到底是直线还是虚线？我们在谈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跟台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很重要的书相比较，就是桑梓兰出版的《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这两部书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都非常有野心，想要吃下整个二十世纪，或是超越二十世纪，大部分人写的书都是聚焦在某个十年（decade），但是这两个人都有“百年大计”。桑梓兰和许维贤的差别是，桑梓兰其实并没有把一些断裂和延续的暧昧不明和纠缠

讲得清楚，但是因为许维贤很“龟毛”，一定会严肃地阐明艳史与性史之间是怎样断裂，怎样衔接，怎样的藕断丝连。这一方面我觉得许维贤做得比较细致，但是有一些话我也想顺便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书里面看到了他讲到了以前的同性恋与现代的同性恋之间的断裂，以前的同志与现在的同志之间的断裂。但是我们其实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明显的是这本书是在讲中国同性恋，那我们所看到老同性恋和新同性恋之间的断裂和延续，那以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之间的断裂和延续是什么？

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角真的是同性恋吗？这本书的主角可能是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作者其实没有讲。或者中国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他有去谈什么是同志，但是他没有去谈什么是中国。我觉得他谈的是北京和上海，并不是中国。有些时候会谈到其他省份，可是他因为自己是出身于北京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对北京有强烈的痴迷。郭沫若、郁达夫这些人曾以上海为基地，所以他会顾到上海，可是基本上大致上他讲的中国是北京和上海。还有他谈的同志书写，什么是同志书写呢？好像也是不证自明，但是书写跟文学不一样，它和文学之间的断裂和延续是什么？我们可以发现，后来他谈到《霸王别姬》和《蓝宇》，虽然说它们都有文学文本，可是实际上，他的心力是放在它们的影像。这能不能帮助厘清书写这部分？这还有讨论的空间。

另外，国家和同性恋的接续和断裂。我们可以发现这本书里面有个倾向，它有讲到，但是我们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有些人的人生的前五年、前十年先当同性恋者，接下来十年就把同性恋戒掉，转变成大中国主义者。当那十年以后再把这个东西戒掉，就好像是嗑药一样，这十年我先用冰毒，然后接下来十年我再用另外一种东西。这个之间是怎么衔接？我觉得可以谈谈看，他有讲到，但是可以再厘清一下。

他这本书始终聚焦中国，没有谈到台湾。我觉得许维贤很诚实，他不觉得做中国研究就要顺便把台湾拉进来，当做附录，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其实中国和台湾当然是有延续的地方，我们不能否认两边是有多的交流，但是也有非常大的断裂，比如书里讲到的一件事是郁达夫树立的文学传统——同志书写传统，中国一直到1990年代才又有新的文学传统出现，就是说中间中断了超过五十年；这中间中断的五十年其实就是台湾的同志文学蓬勃发展的时候，我自己的研究是，台湾的同志文学发展并不是只有白先勇在1960年代才有，1950年代也有。我们这里的听众中有一个留美博士生，她已证明台湾从1900到1940年代也都有（日文写成的）同志文学。有些人会把中国和台湾的同志文学捆绑在一起，可是其实是断裂，需要分开处理的。另外关于日本，我讲到日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因为这点可能是桑梓兰做得比较清楚，可能是因为桑梓兰在国外的东亚系念博士，许维贤是在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念博士，所以不一样。维贤的书比较没有去处理一个跨国的流动，比如在讲中国同志的时候，难道这个同志就是一直在中国？非常纯粹是中国的东西吗？可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孙中山、蒋中正（蒋介石）、郁达夫、郭沫若、梁启超都去日本留学，他们都在那边见证了“同志”在日本是怎么被挪用的。可是许维贤没有深化这部分，在中国这个大熔炉里面，中

国人自己在不断地创新、延续“同志”的用法，好像都没有受到日本的刺激。这其实有点奇怪，因为当中国开始在热烈流行用“同志”来讲革命党人的时候，其实日本也是在这样做。为什么会两边这么巧同步发展，是不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当时有非常密切的交流，所以才会这样。实际上，不可否认，当时的中国性学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曾经有热烈的发展，其实是因为日本的影响，很多性学家到了日本，顺便到了中国。所以，中国和日本在性知识上的断裂和延续似乎还可以再探讨。不过，这可能是我们的事了，因为许维贤写了那么多，或许刚刚讲的这些他没有特别讲清楚的事情，可以让在座尤其是年轻人可以去发挥。谢谢大家！

**刘：**谢谢口才很好的纪大伟！点出了更多相关角度和问题。刚刚从纪老师的发言中，我们发现更多的书要买了，有更多的书要看了。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开放给大家提问。在场卧龙藏虎，是不是有人要发言，或者在场的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听众：**根据你们讲的这本新书有关郭沫若的同性恋，我想到去年刚刚出版的另一本书，香港记者蔡咏梅撰写的《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我很好奇许维贤将会怎么去诠释周恩来很可能也是同性恋的个案。我就把这本书提出来，算是给许老师一个线头，不知道这个线头能够拉出什么线来？

**刘：**好可惜许维贤不在现场，不然他可以回应一下大家的提问。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么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座谈会，谢谢诸位非常精彩的发言，也谢谢大家参与这场座谈会。